



《闽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课程讲义节选

黄凤凤

授课时间：2019-2020 上

第一课历史文化名城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泉州是福建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又称鲤城、刺桐城、温陵，地处福建东南沿海，与台湾隔海相望，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中国国务院第一批（1982年）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古代有“海滨邹鲁”的美誉。

泉州市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泉州境内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六百余处，单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20处，分别是安平桥(五里桥)、清净寺、开元寺、郑成功墓、崇武城墙、洛阳桥、泉州天后宫、清源山石造像、九日山摩崖石刻、屈斗宫德化窑遗址、伊斯兰教圣墓、草庵石刻、蔡氏古民居建筑群、泉州府文庙、磁灶窑址、德济门遗址、泉州港古建筑、陈埭丁氏宗祠、安溪文庙、施琅宅、祠和墓。此外，泉州还拥有著名的十大古民居。

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

（一）形成期—南北朝时期

据陈高华研究员在《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中所述:在南北朝时期，泉州已成为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之一。当时由于中原战乱频繁，北方各族民众相继南迁入闽，不仅为泉州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泉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泉州海外交通初步形成，出现了以梁安港为中心的对外交通港口。

“泛小舟至梁安郡，更装大舶，欲返西国”，“发自梁安，泛舟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描述的便是南朝陈文帝(公元560-565年)时，来华天竺(印度)高僧想要从泉州乘船回国，后来因为当地僧人及官员所阻，未能返国的事情。此处的梁安指的便是泉州，可见当时泉州已经与印度发生联系，开始了海上对外交通。

（二）发展期—隋唐时期

隋朝泉州社会经济日渐繁荣，海外交通崭露头角，有了重大发展。对外海路交通不断扩展，闽广商船，往来于中国、南海之间，并扩至红海、波斯湾头(见高桑驹吉《中国文化史》)，为唐朝打下海路代替陆路的基础。

初唐福建全境户数仅为15226户，至元和年间，泉州人口竟超过福州、建州而升为上州，这离不开当时泉州对外交通的兴起。中唐以后，开元六年(718年)泉州治所自南安移至今泉州市区，经济空前发展，成为闽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人口增多，手工业进步，农田水利改善，为海外贸易的开展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唐朝中期发生的“安史之乱”导致陆上丝绸之路闭塞，中西方的交通转以海道为主，到唐朝末年广州被黄巢队伍攻占造成了巨大破坏，也间接促进了泉州港的发展。

唐朝后期诗人包何曾在《送泉州李使君之任》中写道：“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此诗表现出当时泉州居民中不仅有外国人，而且还有外国朝贡者(这些朝贡者大多是商人)频繁进

出泉州，泉州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五代十国时期，连续占据泉州的王延彬、留从效、陈洪进都注重发展海外贸易，从中牟利。

（三）鼎盛期—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泉州港的对外交通日臻鼎盛。宋神宗曾下诏说：“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创法讲求。”“司”指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重要的对外贸易港都设立市舶司。宋神宗要求研究泉州设置市舶司，说明当时泉州在海外贸易中已居重要地位。后在哲宗元佑二年(1087年)，泉州正式设立市舶司。设司以后，泉州港可以直接发船到海外进行贸易，也能接纳外来商船，因而进出口贸易得到迅速发展，这标志着泉州已进入我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行列。同时，洛阳桥的建立，大大改善了泉州的陆路交通，商品流通更加便捷，为泉州港的繁盛创造了良好的交通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泉州摆脱了对广州港的附庸地位，得以独立开港，这是一个重要转变。

泉州开港以后，北上可经过杭州、明州而通至朝鲜、日本，为广州港所不及。且开港后不久，南宋建都浙江，杭州成为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消费品由泉州源源北运，也为广州所不及。因此，泉州地位优于广州。诗句“况今闽、粤、莫盛于泉州”，“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出洋”，充分体现了当时泉州海上运输的盛况。

元朝泉州继续与海外诸国交通，泉州港更加繁荣。“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运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藪，殊方剗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其民往往机巧趋利，能喻于义者鲜矣。而近年为尤甚，盖非自初而然也。”“号为天下最”说明泉州在全国海外贸易中居于领先地位。

随着许多外国商人和水手涌入泉州，泉州成为各国人杂居的海港城市。当时，泉州遍种刺桐树，外来商人及税收便与“刺桐”(ZAITUN)命名泉州，这个名字也广泛流传于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所历各处。著名的外国旅行家马克·波罗和伊本·白图泰都盛赞泉州的繁荣。马可·波罗归国写成游记，吸引了许多西方人都想到满地黄金的中国来，游记中说：“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成在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中国南方居民一一引者)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我敢说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伊本·白图泰在泉州这里看到大船百数，小船千余，也盛赞泉州港在当时不仅是中国第一大港，也是世界头等海港之一。

到了元末，著名的地理著作《岛夷志略》成书，其影响不下《马克·波罗游记》，作者汪大渊虽是豫章(今江西南昌)人，但他长期在泉州生活随海船出海经商，周游世界。这本著作记录了他亲自到过的世界各国的情况。如菲律宾群岛过去很少与我国交通，该书介绍了三屿、蒲里噜、麻逸、苏禄诸地情况，使泉州人们侨居菲律宾者增多，甚至远至古里地闷(今印尼帝波岛)，亦有华侨足迹。该书还记载了云南的叶金、浙江的瓷器、苏杭的色缎、明州的草席、温州的瓷器…都由刺桐出口，可见，泉州当时已成为全国对外贸

易的重要港口。

（四）没落期—明清时期

明代初期，封建政府为防止倭寇，改变了对外交通的政策，推行“禁海”政策。虽然同样设立了市舶司，但规定泉州港只允许通琉球一国，与昔日可通东、西洋各大国性质大不相同，导致泉州海外交通衰落。到了明成化八年(1472年)市舶司迁往福州，后浯港废，安平港转而成为私商活动的港口，泉州港的对外交通任务至此结束。

清朝统治者长期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人们似乎忘记了我们祖先曾经征服海洋的光辉历史，忘记了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忘记了曾经辉煌过的“刺桐港”。

（五）转变期—20世纪以来

20世纪以来，经过中外学者的不懈努力，证明了古代外国人记载中的“刺桐”(ZAITUN)就是泉州，证明海上丝绸之路曾为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做过伟大贡献。1991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团在泉州进行了全面考察，并举行“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和福建丝绸之路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2015年2月在泉州召开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以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战略，都进一步提高了泉州的知名度，激起了人们对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泉州的了解。

二、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现实意义

目前，中央做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泉州又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中，非常明确地提出要支持福建泉州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先行区，可见，进行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总结历史经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

研究历史可以从容地把握现实并服务于现实。通过对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能够深入挖掘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总结历史经验，寻找泉州历史发展的规律与模式，将研究成果反馈给有关部门，为其科学决策提供理论支持，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建设提供文化基础。当然，这也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具备历史经验，还要有现实和战略眼光，通过透视历史，洞悉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丰富内涵，从而掌握泉州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为决策者制定政治、经济、文化方针政策，提供科学、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依据。

（二）利用文化遗存，大力发展泉州旅游业

当今，旅游业越来越成为一种支柱产业，泉州旅游事业的发展也势必牵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泉州作为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各种文明的荟萃中心，反映了一个时期人类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数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东南亚人、日本人、高丽人还有遥远的非洲人和欧洲人，曾经潮水般涌入这个城

市，为这个城市留下了诸如清净寺、圣墓、草庵摩尼教寺等文物史迹，是值得开发的、宝贵的文化旅游、宗教旅游、寻根旅游、海丝旅游资源。同时，这些文化遗存对来自于世界的穆斯林、印度教徒、冲绳的泉州人后代，分布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泉籍台湾同胞具有独特的认同感和吸引力。当然，这需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者在更大范围内揭示这些文化遗存的内容、特性的价值，并根据历史依据提供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饮食起居、宗教生活和文化生活，为建设配套的旅游设施提供专业建议。

（三）重视文化与经济互动，繁荣泉州对外经贸活动

经济贸易活动是形成“海上丝绸之路”的最主要因素。同时，经济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活动又紧密相关。贸易活动的繁盛促进了文化交流，文化交流也促进了经济贸易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现代社会的经贸活动正在同文化发生更为紧密的关系。大量的泉州经济伙伴分布在港、澳、台和东南亚，新的“海上丝绸之路”时代已经开启，国家当前“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也奠定了泉州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的战略地位。历史机遇要求我们更加重视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更加注重借鉴“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更加善于运用大量文化遗存的价值，包括同“海丝”国家的传统友谊，提高泉州的知名度、扩大泉州的影响力、激发海外三胞爱国爱乡的热情和对祖籍文化的认同感，促进泉州对外经贸活动的发展。

（四）加强闽南文化研究，树立“海丝”文化品牌

泉州“海丝”文化底蕴深厚，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进程中，泉州不仅引进了外来文化，泉州文化也随着航海贸易、移民传播到中国其他地区乃至世界，典型的例子就是闽南文化。地域特色鲜明的闽南文化在海外得到广泛传播，被吸纳成为当地“土著”文化的重要元素，成为我国对外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泉州现在保存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等文化遗存，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丰富的“海丝”文化遗存，不仅成为泉州重要的文化品牌，同时也成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的历史记忆。当前，进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必须加强闽南文化研究，进一步密切同海外三胞的文化联系，树立“海丝”文化品牌，深化中外文化交流。

（五）为加强对台交流提供桥梁纽带

海上丝绸之路是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人民共同开辟的。“海丝”文化是两岸联系紧密、难以割舍的精神纽带，蕴含着宫庙、宗亲、乡土、民俗、文艺等丰富文化资源，对台湾民众具有很强吸引力和感召力，在促进对台文化交流中具有独特地位和突出优势，在联系台湾同胞、招商引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海丝文化作为对外工作的前沿，在福建全省乃至全国对台文化交流格局中，拥有最富地方特色、最具内在价值、最有他人不可替代的优势。当前，应充分运用两岸“海丝”文化的独特魅力，从国家利益出发，把两岸共同传承、保护、交流和发展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作为争取台湾民众民心的一项工作重心，为加强对外交流提供桥梁，加速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此外，加强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还能密切与海外侨胞的联系，发挥侨力资源优势，推动泉州经

济发展，强化全民的文化意识，保护文化历史名城，抢救许多濒临灭绝的文化遗产，对迎接新机遇、新挑战，再创泉州辉煌等，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三、泉州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的发展思路

面向未来，泉州要积极响应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重要论述，围绕“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目标，制定相应发展战略，努力克服和解决矛盾，迎接挑战，发挥泉州独特的文化优势和资源条件，为加快城市创新转型、推动长远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一）重视和加强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

首先，搭建良好的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坚持文化“走出去，请进来”，组织开展系列文化活动，密切同“海丝”国家之间的民间文化往来，加强与“海丝”国家(地区)、友好城市的学术交流、艺术交流和人员往来。同时，发挥华侨众多的优势，加强与居住国(城市)的经济文化交流。

其次，加强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通过完善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机制，营造良好的引才、聚才、用才氛围，吸引相关文化学科和专题研究领域中的高层次人才来泉，培养一批文化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加强与权威学术组织的合作，推动泉州文化、“海丝”文化的创新发展，确立泉州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文化地位和影响。

（二）加快发展“海丝”旅游和创意产业

加快发展以“海丝”文化为主轴的旅游产业。有效整合有代表性的“海丝”文化旅游资源，策划一批以“海丝”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景区项目、旅游文化演艺项目，打造文化旅游产品项目区。推动建设“海丝”旅游联盟组织，实现联盟国家和城市“海丝”旅游景点信息互推，在介绍联盟的海丝旅游景点媒体上，加大相关城市的海丝旅游信息介绍。

加快发展以“海丝”文化为核心的创意产业。贯彻好落实好《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有关政策，政府可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采购优秀“海丝”文化作品和研究成果;优先扶持有关文化衍生品和旅游、创意产品的开发;适当放宽对泉州“海丝”有关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的认定标准，加大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扶持。同时，推动泉州与海丝沿线国家、城市在茶文化、雕艺文化、陶瓷文化、香道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加快推进世界茶文明史馆、雕艺文创园、陶瓷文创园、中国香都等项目建设。此外，还要认真策划生成一大批“海丝”文化产业项目，加大招商力度，推动跨地投产，提升“海丝”文化产业水平。

（三）建立健全经贸文化联动发展机制

主动纳入国家“一带一路”规划。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积极争取支持，将泉州纳入国家“一带一路”规划的重要节点城市，给予优惠政策和专项资金扶持;积极承办“海上丝绸之路品牌博览会”等一系列交流对接活动，推动筹建“海丝”城市联盟，探索建立与沿线各友好城市、多边国际机构等联系协作的

常态化机制。

积极搭建组织机构和平台。成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文化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具体的实施意见，加强对“海丝”文化活动的组织领导，细化政策措施，明确市、县(市、区)、镇(乡)三级及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工作分工，进一步健全政府横向及纵向联动机制，指导推动“海丝”文化活动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并得到落实。着力打造活动平台，推动建立侨商总部，设立海外华裔寻根谒祖的服务平台，推动实施涉及海洋领域的国际合作项目，多渠道构建一批利于“海丝”跨区域合作、对话的开放型交流平台。

(四) 培育和打响“海丝”品牌

加强文化规划，加大资金投入。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的部署要求，依托“海丝文化”的功能作用，联合兄弟城市做好“海丝”申报世界遗产工作。同时，以“海丝”文化为内核，找准“海丝”文化遗存与现代城市建设的结合点，把历史和现实、传统和现代、经济和文化有机结合起来，科学制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的总体规划，加大建设力度，加大资金投入(包括政府的和民间的)，明确“海丝”建设的短期、中期、长期目标，使“海丝”建设真正融入城市建设大局，重振“东方第一大港”雄风。

拓展平台空间，打响海丝品牌。充分发挥泉州作为海上丝路起点、“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东亚文化之都”和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核心区等优势条件，以“海丝”文化、闽南文化为主要载体，深化人文交流合作，构建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文社会沟通平台，打造“海丝”品牌。

第二课闽南文化——泉州“海丝”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一、泉州“海丝”的历史文化遗产魅力

(一) 物质文化魅力是泉州“海丝”魅力之基

海上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经贸路，其次才是文化路。宋元时期泉州经济发展模式为“贸—工—农”式，外贸是整体经济的核心，进而带动了工农业发展，发扬了自身优势避开了劣势，成就了东方第一大港。外向型港口，当时与泉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增至近百个，是国际上的重要贸易港，也是中外各种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海外贸易、向海经济的发展，不仅为当时的封建统治集团提供了重要的经济财源，更为泉州各类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当代泉州民营经济的崛起，与泉州传统经济结构有着重要联系，也深受传统经济文化影响。

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带动了泉州的造船、建桥、制瓷、纺织、冶炼等行业的发展，外贸需求也刺激了制茶、煮糖等工艺的提高，这些行业的技术也得到了发展，在科技史和人类的物质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为了方便货物转运、商民往来，出现了修建石桥的高潮，带动了桥梁建筑科技的发展。据乾隆《泉州府志》记载，泉州历代造石桥 206 座，其中宋代 105 座，著名的有安平桥、东洋桥、石笋桥、普利大通桥等，所以有“闽中桥梁甲天下”之誉。安平桥是中古时代世界最长的梁式石桥，也是中国现存最长的海港大石桥，堪称古代汉族桥梁建筑的杰作。北宋皇佑五年至嘉佑四年(1053-1059 年)由泉州知州蔡襄主持修造的洛阳桥，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跨海石桥，其“筏型基础”、“种蛎固基法”，是中国乃至世界造桥技术创举。泉州外向型经济结构，要求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支撑，又刺激了造船技术的发展。三国两晋时期，泉州已能造大海船与南洋诸国往来，隋唐时期，泉州是当时全国主要的造船基地之一，宋元时期，福建所造海船质量居全国之首，这一时期的战船和舟师也大都福建招募。泉州造船业也兴盛发达，成为全国重要的造船中心，《太平寰宇记》将“海舶”列为泉州土产。这一时期，政府多次命泉州造船，元十七年，泉州为朝廷造船 3000 艘，除官营造船业外，私营造船业也很发达，当时，从后渚港至泉州城南晋江下游沿岸的滨海地区是当时泉州造船和修船的集中地。泉州所造海船，无论从坚固性、稳定性、适航性，特别是水密隔舱的安全措施等，在当时都具有先进的世界水平。1974 年泉州湾宋代海船的发现，便是例证。

宋元时期，泉州的手工业因地制宜地抓住了外贸这一大好机会，发展迅速，门类多、规模大、技术水平高。较之之前，泉州手工业生产实现区域化，并与外贸挂钩，产品为出口服务。这一时期，泉州的丝绸织造技术，通过不断吸取外来的先进方法和技术革新而日臻完善，其织造、印染、刺绣技术和花式讲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畅销海外，从黄昇墓出土的丝织品，可以看到泉州对我国丝绸织造技术发展的贡献。德化是我国古代南方著名的产瓷地区之一，自宋代以来，其生产的产品就大量销往海外，销售范围遍及亚欧非一些国家，产品种类多，技艺精湛，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出口商品。明代，德化在全国首创著名

的“阶级窑”，装烧容量大、省料且易于控制烧成温度，烧成品质好，烧成技术如火纯青，其象牙白瓷产品被誉为“国际瓷坛明珠”“中国白”，明代瓷雕大师何朝宗的瓷观音、如来等瓷雕艺术品，精美绝伦，被誉为“东方艺术珍品”。德化制瓷技术还深深影响世界各国。日本的窑炉是受德化阶级窑的影响而设计的，日本也据此将德化窑“估计为串窑的始祖”。

元代南安人发明蔗糖盖泥脱色法，明嘉靖《惠安县志》记载了白糖制法。《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埃及人至永春传授制糖技术，使得永春制糖技术得到较大改进和提升，据记载：武干市（今永春），“这个地方以大规模的制糖业著名，出产的糖运到汗八里（北京），供给宫廷使用。”此外，作为东方第一大港，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国外物产，丰富了泉州乃至中国的物产。如玉蜀黍约在明隆庆年间首先传入安溪试种，之后逐渐传至全国。烟草

业最初是由华侨从吕宋传入泉州、漳州等地种植。刺桐也是从海外传入的植物，晚唐诗人陈陶在诗中就有对泉州刺桐的描述，五代时泉州就以刺桐城和刺桐港闻名于世。大食的椰枣也在宋元时传入泉州，其他如高丽菜、翁菜、葱、荷兰豆、茉莉、番石榴、番木瓜、番橄榄。

（二）非物质文化魅力是泉州“海丝”魅力之形

作为东方第一大港，泉州与外界除进行物质产品的交流之外，也与外界进行精神文化产品的交流以及人口的流动和交融。泉州商贸的繁荣，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外来人聚至泉州，出现“民夷杂处”的景象，其中的“夷”以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和中亚的穆斯林为最多，其中很多在泉州定居并与当地人通婚，据此泉州就有“回半城”、“蒲半街”之称，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泉州教门林立，道教、伊斯兰教、明教、摩尼教、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景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都曾在泉州流传和发展，并与泉州民间信仰和谐共生，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在婚姻、丧葬、节庆、饮食、建筑、服饰等各个方面相互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民俗风情和地域名产。如建筑方面，中西合璧，艾苏哈卜大寺的建筑仿照了大马士革伊斯兰教堂的建筑形式，它的“望月台”圆形穹顶，吸收了中国古代建筑藻井一类的石构图案。民间信仰方面，因地缘以及谋生于海而诞生了海神崇拜，如妈祖、观音等，移民、经商等带来的多样人口也形成了广泛的俗神崇拜，泉州奉祀的民间信仰诸神，很多都是历代的英雄人物和忠烈之士，或者曾为著名做好事、善事的历史人物，如妈祖、关帝、保生大帝、萧太傅、青山王、广泽尊王、清水祖师、苏夫人姑，等等，这些信仰很多与当时泉州的古代航运和渔业密切相关，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将这些信仰传向海外，成为海内外泉州人的强大精神支柱。服饰方面，惠安女服饰、浔埔女服饰与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泉州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服饰。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有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南音、梨园戏、泉州北管、高甲戏、提线木偶戏、晋江布袋木偶戏、打城戏等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南音因积淀了中国古代大量历史遗产，如继承唐以来的“琵琶”、“尺八”、“奚琴”遗制，有“汉相和歌”、“晋清商乐”和“唐宋雅乐

燕乐”的遗音和演奏规制，因此南音被认为是“晋唐古乐”、“千年绝唱”、“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南音的弹唱乐器、曲谱及内容，都有汲取域外成分，如《普庵咒》开头具有浓郁的印度佛教色彩，历史上，中外音乐相互借鉴和融合，泉州南音也融合了波斯音乐的部分元素。同时泉州戏曲艺术历史上通过交流与互动，也传播到海外，如泉州一批明代戏曲和弦管刊刻本，是在日、英、德等地的图书馆及收藏家手上发现的。除戏曲艺术外，德化瓷烧制技艺、乌龙茶（铁观音）制作技艺、水密隔舱造船技艺、闽南民居营造技艺、闽南民居(传统建筑)营造技艺、闽南民居(蔡氏古民居)营造技艺、闽南民居(杨阿苗民居)营造技艺、闽台东石灯俗“嗦啰嘞”习俗、蟳埔女生活习俗等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外还有众多省级、市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泉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中原文化、古越文化、海洋文化长期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质的泉州文化，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如五里长桥、洛阳桥、六胜航塔、灵山圣墓、清净寺、晋江草庵、开元寺、天后宫、九日山摩崖石刻，以及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都是泉州“海丝”魅力之形。

（三）内在精神魅力是泉州“海丝”魅力之“魂”

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长期的劳动实践和文化创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这些是泉州“海丝”魅力之魂，包括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开放姿态与胸怀，敢为人先、爱拼敢赢的向海拼搏精神以及爱国爱乡、乐善好施的大爱精神。

泉州“负山跨海”，耕地缺乏，依靠耕地没办法完全解决生存问题，继而转向海上，“以舟为车，以楫为马，以海为田，以大洋为生命。”大海不仅养育自然之物，同时也锻造了万物之灵的非凡品格。大海酝酿深沉，掀动狂飙，它是容纳的榜样，博大的导师。走向海洋，也让泉州先民见识了到了大海的开放与包容，也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大海的品格也深深的烙印在他们的心里。随着经济的发展，泉州港逐渐繁荣，泉州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转变，宋元时期，泉州商业贸易成为经济的主导。商业贸易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带来的是外商（外地人及外国人）的增多，及其文化的多样，泉州以其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开放姿态与胸怀迎接外地人及其文化，各种肤色各个民族与国别的人，在泉州都获得了较为满意是生活与工作环境。历史上泉州的众多杰出人物中就有很多外地人，如蒲寿庚是阿拉伯人，泉州的姓氏中有很多也是来源于外地。除了本地人与外来人和谐共处外，本地文化也与外地文化相互交融，如宗教文化、民俗民间文化、艺术文化、海交文化、科学技术相互交错、包容和渗透，长期东西文化的交汇和多元宗教文化的兼容，构成了当前泉州文化异彩纷呈的壮观景象。从古城泉州，便可以看到其交织着的各种文化的厚度、深度与广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格局。泉州的开放、包容，也使其敢于走向世界、走向海外，并将中华文化传至海外，至今泉州籍海外华侨达 700 多万，使泉州成为著名侨乡。泉州能成为世界著名港口，也离不开泉州人能容天下之人、能容天下之物的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开放姿态与胸怀，正因为如此，泉州才有

可能成为世界海交史上一段奇迹，成为一个“世界文化的聚焦点”。

古代泉州人并未因大海的阻隔而驻足于海边停滞不前，而是在以后的历史活动中陆续涌向大海，他们依赖大海，征服大海，从大海中获取丰富的物质所需，也获得巨大的精神财富。据专家分析，“蚩民”是泉州人的祖先，他们较早就掌握了独木舟技术，并漂洋过海走向台湾和南太平洋，是中华民族航海事业的伟大开拓者。之后，随着泉州海洋文明的勃兴和海外贸易的发展，泉州人在海边不断开辟港口，并无畏地涌向大海，这其中也有无数泉州人远离家乡，拓殖南洋，虽遭遇无数艰难险阻，都能坚持拼搏在异国他乡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泉州先民在与大海风浪的搏击中，不气馁、不退缩，那怕有牺牲，也勇敢拼搏。所谓“泉州人个个猛”、“输人不输阵”、“爱拼才会赢”便是敢为人先、爱拼敢赢的向海拼搏精神的写照。宋元时期，泉州能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海上商贸如此繁荣，跟泉州人敢为人先、爱拼敢赢的拼搏精神分不开。明清时期，虽有“海禁”，为了生存和发展，大批泉州人冲破海禁，向外谋生，谱写了一部部泉州人海外艰难创业的奋斗史。

爱国爱乡、乐善好施的大爱精神在泉州人的血液里流淌。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大量泉州人走向海外，他们走时带上家乡的香火、护身符、图案、香灰和泥土以及对家乡的认同和归属，走向世界各地的泉州人始终没有忘根、忘记家乡，不论走的多远，始终怀着对家乡的赤子之心。在海外仍然按照泉州习俗，祭祀自己的祖先和家乡的神明，有条件的还会特意回到泉州祭祀祖先和神明，也有人把祖先和逝去亲人的牌位带到海外，以便时时祭拜。在海外谋生的泉州人也是彼此扶持，个人有所发展的，都会为帮助乡亲、回报家乡，比如捐资建立泉州同乡会馆以帮助新来的乡亲适应陌生环境，捐资建设家乡等等。宋元明清时期，泉州的很多公共事业如文教卫生事业是民众自行捐款修建的，有钱捐钱，有力出力，以帮助建设公共事业成为泉州人的荣耀和习惯。近代国家面临苦难，泉籍爱国侨胞积极捐款捐物或返回祖国，投身于救国运动中或者投资家乡事业，为祖国和家乡做贡献。

三、泉州“海丝”的历史文化魅力的现代开发

泉州作为海丝起点，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魅力，如何推动泉州“海丝”历史文化资源的转化及其历史文化魅力的释放，实现泉州“海丝”历史文化弘扬与城市发展共赢，是泉州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具体而言，泉州“海丝”魅力的开发与复兴，要从物质层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精神内核升华等多方面、多层次努力。不仅要将其作为一种城市旅游资源，借助城市观光、休闲旅游等方式，更要将其作为一种城市建设的核心资源，将泉州“海丝”魅力融于城市建设中，特别是融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中，将泉州“海丝”文化浓于整个城市，从城市的外在走向城市的内心。

（一）物质层面要保护与开发泉州“海丝”

历史文化遗存泉州“海丝”历史文化魅力的开发，要从物质层面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将其作为一种城市资源，通过多种途径释放其价值。古迹是一座城市的重要坐标和象征，具有“无可替代”性，

因此首先要围绕“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东亚文化之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定位，从物质层面确定保护的实体内容（如表 1 所示），并就这些实体的保护进行总体规划，划分保护区域，如分片区、街区、主题进行保护与开发，明确保护等级，明确各个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方案，特别是重点保护区。这是一项系统繁杂的长期的工作，可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就此问题进行实地调研、考察，共同研究如何规划、分区及定级，可结合国内外相关成功案例，进行学习和借鉴，其次，根据划定的保护区，明确保护区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对于一些破坏较为严重的保护对象，要尽最大努力去还原和保护，如安平桥、洛阳桥。在建设控制地带，可建立与之相应的历史文化主题公园、历史文化街区及休闲旅游产业。保护区外围地带，要调整用地规划、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交通，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发展创造条件。最后，要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在保护的基础上，要借助多种方式要适当开发，释放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价值。依托历史文化资源最为直接的开发思路是发展旅游业，泉州可结合自身文化优势，推出海上丝绸之路多个“文化旅游”产品和品牌，如可以推出“泉州航海与通商贸易之旅”、“泉州古城历史之旅”、“宗教博物馆与多元文化之旅”三大主题的旅游产品，亦可根据表 1 的分类，推出以某一内容为主题的旅游产品，并组织相关专家学者为这些旅游产品做出详细的游览线路规划、交通及食宿推荐，每一个产品形成一份旅游指南，并首先向泉州市民普及，增加泉州市民对泉州“海丝”文化的了解，增强对泉州“海丝”魅力的感知和自信，激发其传承和发扬泉州深厚的历史、文化的动力和激情。泉州市民普及之后再向外地游客推介，从而可以营造良好的氛围、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些旅游产品和主题推出后，亦可学习其他城市，以公共交通为载体开辟泉州“海丝”主题观光旅游线路。

表 1 泉州“海丝”历史文化遗产

分 类	内 容
古街巷与民居	中山路、陈埭丁氏祠堂、蔡氏古民居、杨阿苗故居、蔡资深故居
古寺庙	开元寺、真武庙、清净寺、清水岩、沙格灵慈宫、昭惠庙、花桥慈济宫、文兴宫、美山天妃宫、通淮关帝庙、延福寺、元妙观、承天寺、龙山寺、永宁城隍庙、崇福寺、青山宫、府文庙、天后宫、安溪县文庙
古塔	六胜塔、关锁塔、东西塔、五塔岩石塔、诗山塔、陀罗尼经幢
古桥梁	洛阳桥、安平桥、东关桥
古遗址	泉州市舶司遗址、来远驿遗址、南外宗正司遗址、德济门遗址、泉州古城遗址、南少林寺遗址、招贤院遗址、
古墓葬	伊斯兰教圣墓、郭仲远墓、丁氏回族墓群、王潮墓、郑成功墓
古窑址	屈斗宫德化窑址、磁灶窑址、南坑窑址、安溪瓷窑址
石刻与造像	九日山摩崖石刻、清源山摩崖石刻、莲花峰石刻、草庵摩尼光佛造像、老君岩造像、瑞像岩、赐恩岩观音造像、碧霄岩三佛像
古渡口	石湖码头、法石渡、富美渡
古港口	洛阳、后渚、法石、石湖、蚶江、祥芝、永宁、深沪、福全、金井、石井、围头、安海

（二）重视泉州“海丝”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与开发

泉州与“海丝”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多且价值高，但其传承和发展却面临较大困难，需要各方

面力量的推动和支持。首先，要发扬特色和传统技艺，开发传统产业。历史上泉州就是以商贸为核心的港口城市，海外贸易繁荣，传统行业积淀深厚，推动泉州民营经济发展，要大力发挥和挖掘泉州自身传统行业、传统产业优势。历史上泉州的丝绸纺织技术、制瓷、制茶、航海、造船、传统建筑、建桥等技术具有较高水平，这些行业和领域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德化瓷烧制技艺、乌龙茶（铁观音）制作技艺、水密隔舱造船技艺、闽南民居（传统建筑）营造技艺、闽南民居（蔡氏古民居）营造技艺、闽南民居（杨阿苗民居）等技艺也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泉州经济进入转型期，在这些行业和领域大有文章可做。这些泉州传统技艺珍宝，属于泉州人民也属于世界人民，其传承和开发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技艺的传承和保护，需要政府将其置于战略高度，将其作为泉州乃至世界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资源，给予系统性、全方位的支持，从相关技艺人才培养到相关研究中心建立，从政策资金扶持到一定市场引导，需要从各个方面共同努力。

其次，传统艺术方面，要推动艺术走进普通民众生活，特别是走近年轻人。泉州南音、梨园戏、高甲戏、提线木偶戏等传统艺术，走的都是“高大上”路线，普通民众很难接触到，虽然这是很多因素决定的，但艺术源于生活，又必须走向生活。在实地考察了泉州南音艺苑、高甲剧团、泉州影剧院等地后，发现场地很大，却门庭冷落，也很少获知有演出的消息。作为泉州的传统艺术，它属于世界人民，更属于泉州人民，在网上不难找到关于这些艺术走上了国家大舞台走向了世界的报道，但在其生长的土地里却找不到踪迹，这样的艺术发展道路前程堪忧。艺术必须切近人民生活、必须走近人民生活，比起传统艺术后继无人，当下最为关键、也是解决前者的根本在于让这些泉州传统艺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民众，让每一位泉州人可以共享、共赏、共同参与这些艺术的发展和传承。不仅要免费开放演出场馆，在管理服务上也应该更加人性化，注重宣传，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扩大自身影响力，做到演出信息公开、上网、下乡；政府也应该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这些艺术支持，给予艺术发展和传承的物质保障，创造平台和机会让艺术下乡、下基层；组建强大的师资队伍，让市民都可以学唱试唱。艺术在走进人民群众的过程中，自然会萌发勃勃生命力。泉州这些传统艺术走进人民，人民才会真正了解和理解这些艺术，进而才会支持和对这些艺术产生兴趣与热爱，才能保证这些艺术后继有人。

此外，这些传统艺术也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资源，其传承和发展也需要游客这些散落世界各地的传播者，可开发针对外地游客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内容，如在内容和曲目选择上注意观赏对象的特点，也可让游客参与，如试唱试学南音表演，试做泉州花灯、德化陶瓷，等等，还可开发依托这些传统艺术的工艺品，让游客把这些文化实实在在可以带走、传播。

（三）注重泉州“海丝”精神内核升华

当今世界，一个城市最有竞争力的是其文化和精神，它已日益成为一个城市发展的主动力。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东亚文化之都、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给予了这座城市不一样的特质、

精神和魅力，这些是泉州城市文化的品牌和核心竞争力。当前泉州城市发展，必须发挥自身优势，以深厚历史文化为城市名片，打文化牌。要发扬“海丝”魅力，传承“海丝”精神，把“海丝”文化和精神作为一种无形资产，作为泉州城市的灵魂，塑造泉州城市形象，打造泉州文化品牌。当今城市形象同质化倾向严重，现代化城市模式雷同性高，泉州必须避免“跟风热”，以“海丝”文化与精神塑造泉州城，突出泉州特质。

当今快速的城市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是现代城市硬件的一路飙升，从地铁、高速公路到超级市场、大型购物广场，每一个城市都有这样那样的相似，文化差异逐渐模糊，城市的人文精神逐渐消解。泉州深厚的文化积累、别样的建筑风格和独特的风土人情，是泉州的特色和品牌。因此，泉州的城市建设、城市建筑必须突出泉州特色，反应泉州历史文化，让泉州城市建筑有自己的风韵。泉州有三开间或五开间红砖白石双坡曲燕尾脊的汉式古大厝，有“手巾寮”的纵向住宅，有骑楼式的商住合一的建筑，还有洋楼、番仔楼“吊脚楼”，都各具风格、各有风韵。这些建筑文化反映了泉州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面貌，也反映了泉州人的特点、审美情趣及价值取向。当前泉州的城市建设，应该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构建自己特色和风韵的城市建筑文化。城市建设规划要把泉州“海丝”文化作为规划的基本要素，指引泉州城市的整体布局，各种市政建设都应该突出建筑的泉州味，体现泉州文化。此外，要结合泉州打造海丝小镇和闽南文化小镇，对一些泉州老建筑、欧式建筑等进行保留与修复，建设多元建筑文化带，如传统闽南风格、东南亚风格、阿拉伯风格等，以展示泉州城市精神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彰显泉州的文化精神和价值。

二是城市景观、路标、公共交通、街区等公共空间和设施的建设，要赋予其文化内容。要根据泉州文化特点和泉州精神，规划城市公共空间，精心设计城市标识，让生活其中的居民在其工作和生活的家园找到精神和情感寄托，感受泉州城不一样的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公交站台及公交车是流动的城市文化，它与每个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市民的心理和精神，而泉州的部分公交车及站台比较破旧和简易，政府及有关部门应该把公交交通作为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载体和平台，在站台的设计上要突出各个城区的文化特点，甚至可以把各个城区标志性的历史遗迹元素融入站台设计中，并在相应区域的公交站台的指示标上对附近区域的历史遗迹做推介。公交车车身目前较多都是各种商业广告，泉州“海丝”文化也面临“酒香还怕巷子深”的境地，应该借助公交车车身这个流动的宣传平台，不同线路根据线路特点设计不同的历史文化宣传内容，公交车座椅及车内也可以赋予其相应的文化元素，让市民乘坐公交车的同时来一场文化之旅。城市的绿化及景观也应该赋予其“海丝”文化内涵，让泉州的一草一花一物皆文化。

三是抓住泉州的一些重大节日、活动和事件，弘扬和提升泉州文化和精神。如抓住泉州民俗文化中一些重要节日，进行文化宣传和精神引领，增强市民对泉州特色文化的自信、自豪，提升传承泉州文化和精神的自觉。针对属于泉州自身的一些活动和事件，如在泉举办的海丝文化节、国际木偶节、南音大会唱、中国泉州南少林武术节、“东亚文化之都·2014泉州活动年”系列活动、亚洲艺术节、央视春晚分会场等

重大活动和事件，是激发市民学习和了解泉州文化、养成泉州品格和精神的有利契机，应该借机宣传和动员。

第三课闽南文化——泉州海丝文化遗迹中的佛教乐舞研究 ——以“飞天”为例

一、泉州海丝文化遗迹中的佛教乐舞历史溯源

泉州，自古佛教盛行，唐朝就有“泉南佛国”之称，是佛教文化传入中国最早最集中的地方之一。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对泉州有“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的赞语。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起源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印度。西晋时，佛教传入泉州。南朝以来，佛教主要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条线路传播到泉州。唐代中期，陆上丝绸之路渐趋衰落，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崛起，成为中国对外商贸、文化交往及佛教传播的主要通道。宋元以后，泉州发展成为“全国第一大港”，从泉州出发的多条海外交通航线中，尤其以泉州至印度及阿拉伯半岛航线最为繁荣，海上丝绸之路也因此成为佛教及佛教乐舞传入泉州乃至中国的主要通道。到宋元时期，泉州的佛教及佛教乐舞达到空前繁荣，后历经元、明、清、民国，随着佛教逐渐世俗化，越来越与民间杂神、民俗相结合的趋势，佛教乐舞也逐渐融合多种宗教、民间信仰及文化艺术，形成独有的表现形态。

据史料记载，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应梁武帝之请，扶南泛海出发，“以（南朝·梁）大同十二年（546年）八月十五日，达于南海（今广州）。……，陈·永定二年（558年）七月，还返豫章（今江西），又上临安（今杭州）、晋安诸郡。”“据考证，六朝时虽晋安郡郡治在今福州，但拘那罗陀逗留晋安郡、梁安郡及翻经的地点是南安丰州九日山下的建造寺——延福寺。”由此可见，拘那罗陀是最早来泉州弘法的外国人，南安丰州是史料记载中泉州最早出现佛教的地方。此后，伴随着佛教文化在泉州的兴起和繁荣，佛教乐舞也落地开花，在泉州迄今尚存的近300座佛寺、20座石经幢等建筑中保留有大量弥足珍贵的佛教乐舞遗存，例如泉州开元寺、南安桃园宫陀罗尼经幢、鲤城区通天宫经幢均有佛教乐舞“飞天”的遗存。印度佛教乐舞传入泉州和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密切相关，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佛教乐舞逐渐与泉州地域文化相结合，形成富有泉州特色的佛教乐舞文化。

二、泉州海丝文化遗迹中的佛教乐舞“飞天”

（一）泉州开元寺的“飞天”

建于唐垂拱二年（686年）的泉州开元寺，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规模之大，拥有120个支院，是佛教丛林之冠。开元寺大雄宝殿斗拱上的24尊手持南音乐器翩翩起舞的“迦陵频伽”飞天妙音鸟，既真实地记录了唐代泉州佛教乐舞的盛况，又反映出泉州乐舞吸收印度佛教乐舞，并与之相融合的文化景

观，是泉州海丝文化遗迹的历史见证。

开元寺大雄宝殿又称紫云大殿，建筑面积一千三百多平方米，供奉五方佛。五方佛前上方柱顶斗拱处附雕 24 尊以人扮鸟、身穿鸟衣的佛教乐舞“妙音鸟乐伎”——“迦陵频伽”，分成两排且面面对，这是“迦陵频伽”舞的一种传统队形。如图 1：



图 1 开元寺大雄宝殿“飞天”

这些“迦陵频伽”体态婀娜、双翼舒展、羽毛灿烂、雍容华贵。她们头戴花冠，半裸着的上身穿一件色彩斑斓的小背心，“上半身向前伸出，臂腕上戴金镯宝钗，或持砚挥毫，或曲臂吹笙，或手抱琵琶，或轻歌曼舞，披帛飘扬如仙”，背上长着一双翅膀，下半身嵌在柱榫里，两肋露出鸟爪。从造型看，24 个妙音女神且舞、且歌、且奏，俨然正在上演一出大型、庄重的飞天乐舞，是典型的印度佛教乐舞与泉州唐代乐舞完美融合的结晶。

大雄宝殿后面有一座建于北宋天禧 3 年（公元 1019 年）的甘露戒坛，历代重修，坛为五级，仍仿宋制。戒坛最有特色的“蜘蛛结网”式的藻井斗拱和四面珩梁处，刻有 24 尊衣带飘拂、翩翩飞翔的“飞天乐伎”木雕。这些“飞天乐伎”与大雄宝殿里的“迦陵频伽”不同，她们不是人首鸟身，而是完全人的形象，与陆上丝绸之路的敦煌“飞天”有些相似。这 24 尊“飞天乐伎”大多半裸上身，穿小件背心，或双手正握品箫向上高高举起；或左手握琴颈，右手斜托琴腹；或持二弦、椰弦，双臂前伸，双肘外展成圆；或双手握箫，垂直于胸前。从这些“飞天乐伎”的动作姿态可以想象，她们仿佛正在表演大型乐舞，且场面辉煌壮观。由此，本文认为，开元寺北宋甘露戒坛的 24 尊“飞天乐伎”，实际上代表了北宋时代泉州佛教乐舞兼容并包的风格和气势恢宏的规模，无论是大雄宝殿的“妙音鸟乐伎”还是甘露戒坛的“飞天乐伎”，她们都是以佛教为载体，从印度“迦陵频伽”演化发展而来的，也显示出当时泉州佛教乐舞因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而繁荣，也展示出河西走廊陆上丝绸之路乐舞文化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乐舞文化的亲密融合。

开元寺大雄宝殿和甘露戒坛的“飞天”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她们不仅呈现出一种飞翔的姿态，而

且展现出一种负重的形象，这在中国其它地区的“飞天”中是很少见的，深入探究，形成这种形态的原因和“飞天”这种西来的佛教形象传播途径有着重要的关系。“‘飞天’及佛教在北方的引入和传播途径，是沿着古代陆上的丝绸之路进行的。……很明显，广州、泉州这两大古代海上口岸城市，拥有发达的海上交通，使得印度佛教得以自海上直接南传中国。而作为口岸，中印的交流结果更直接地作用于泉州，不同于陆上丝绸之路需要经过很多文明地区，一站一站的先经洗礼融合再传递。所以，泉州的“飞天”斗拱的设计意识跟来自印度的文化可能有莫大的关系。”并且，在现在的印度教堂中仍然可以见到以负重形象出现的“飞天”，如图2：



图2 印度教堂飞天

这与泉州开元寺的“飞天”形象极为相似。由此可以看出，泉州开元寺的“飞天”是将印度的“飞天”形象和中国特有的斗拱建筑相结合，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态，由此判断，泉州开元寺“飞天”很可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直接来源于印度。开元寺佛教乐舞“飞天”作为海丝文化的重要遗迹，在惠安东湖《鑑湖张氏族谱》中得到了进一步印证，“十四世张氏逊，字法参，官主簿三余，以木雕游寺观，所治皆绝品，如泉州开元寺飞天”，可以得知，惠安的张氏逊就是“飞天”的雕刻者，是鉴湖张氏十四氏族。可以断定，尽管大雄宝殿始建于唐代，但其24尊“飞天”却出自宋代，也就是说，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和甘露戒坛的“飞天”皆出自宋代，但两种“飞天”却有不同，甘露戒坛的“飞天”是中国传统带飘带的形象，而大雄宝殿的“飞天”却是带翅膀的形象。究其原因，宋代泉州已成为中国甚至是远东的最大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除佛教之外，伊斯兰教、摩尼教、基督教、印度教等多种宗教并存，智慧的泉州“结合印度的迦陵频伽、中国的飞天和西方的天使而造就了我国仅存的带翅膀的‘飞天’形象”。并且，宋代伴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印度佛教乐舞传入中国的通道逐渐从陆上转向了海上。

综上所述，泉州开元寺“飞天”印证了印度文化对泉州佛教乐舞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的。

（二）南安桃园宫陀罗尼经幢的“飞天”

泉州市南安桃园宫陀罗尼经幢始建于北宋天圣3年（1025年），八角七层，高七米，雕刻有陀罗尼经、迦陵频伽、飞天、佛、菩萨、力士、海浪、莲瓣等造型和图案，整体造型气势非凡。桃源宫弥陀罗经幢作为泉州海丝文化遗产，不仅是研究泉州建筑、雕刻、书法等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泉州佛教乐舞的重要遗迹，它全面反映了宋代泉州佛教乐舞的发展状况。



图3 泉州桃源宫弥陀罗经幢“飞天”

桃源宫陀罗尼经幢的须弥座转角各雕有一尊侏儒大力士，束腰雕持乐“飞天”，上施水波纹平座，平座上置覆盆，一层幢身浮雕双龙抢珠，二、三层浮雕佛像，四层每面分行竖刻《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四至六层施用挑檐翘角，间用仰莲一朵，幢身每面浮雕各式佛像，每面翘角装有铁环，七层幢身与檐均作方形，出檐分别雕有四尊人身鸟翼、重翼羽状“飞天”，用来表示佛教的“法音宣流”，并以优美的声音和舞姿供养和取悦于佛。如图3：

尽管现存南安桃源宫弥陀罗经幢上雕刻的束腰“飞天”浮雕，损坏较为严重，但从身体形态依然可以看出其流畅的线条和风韵的姿态。从造型上看，这4尊“飞天”左右各有两个翅膀，体态丰腴，身形较小，尽管泉州很多寺院、古塔都雕刻有“飞天”，但桃源宫经幢上的这些“飞天”，

则代表了泉州早期“飞天”身材短小的形态特点。“飞天”一般多出现在壁画上，而在石经幢上较少出现。除了泉州南安桃园宫陀罗尼经幢，“飞天”还出现在始建于大唐中十一年（857年）金华法陇寺经幢、建于五代梁贞明二年（916年）杭州梵天寺经幢的顶部。通过对比这三座经幢的先后建造时间以及造型，我们发现，三座经幢均是人身鸟翼、舒展双翅、呈飞翔状态，可以判断，桃园宫弥陀罗经幢上的“飞天”借鉴了唐五代时期江浙地区的“飞天”造型，而唐代时江浙的明州（今宁波）、扬州、苏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包括金华、杭州在内的江浙一带受到海上丝绸之路的极大影响，海丝文化已经相当成熟，并且当时的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城市的重要地位也在逐渐崛起，因此，本文认为，泉州南安桃园宫弥陀罗经幢上的“飞天”也是在海丝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

三、泉州海丝文化遗迹中的佛教乐舞与地域文化的融合

（一）佛教乐舞与南音文化

泉州南音，古称弦管、南管，是发源于泉州的古老音乐，由器乐和声乐两大部分组成。“泉州南音以洞箫、南琵琶、三弦、二弦及拍板的坐奏称‘顶四管’，以南嗩（唢呐）、南琵琶、三弦、二弦及拍板的坐奏和响盏、小叫、木鱼、双铃、四宝及扁鼓等乐器的立奏合称‘下四管’”，是最具泉州地域色彩的古老的音乐文化。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的 24 尊“迦陵频伽”手中拿着的乐器和舞具，就是典型的南音乐器，有琵琶、三弦、嗩仔（唢呐）、洞箫、拍板、扁鼓、双铎、钱棍等。如图 4：



图 4 持嗩仔的“飞天”

靠石柱上的 12 尊大飞天，展翅高飞，手持文房四宝，青素瓜果，在大雄宝殿牌匾对侧的 6 尊大飞天之间用 2 尊小飞天隔开，她们都拥有蝙蝠式的翅膀，呈现螺旋状。其中，南音乐器中的琵琶最有特点，即琵琶头部向后成 135 度钝角，呈曲首状。如图 5：



图 5 持琵琶的“飞天”

从《月书》的记载中，可以证明它的形制接近唐代琵琶的规格，弹琵琶的姿势为横抱，这与北方的琵琶有所不同，故称之为南琵琶。更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一尊小“飞天”手持的拍板（旧称檀板）与《韩熙载夜宴图》中一位官员手持的拍板形制相同，由此可见南音的悠久历史，也反映出了佛教乐舞艺术与古老泉州南音文化的生动融合。如图 6



图6 持拍板的“飞天”

甘露戒坛的 24 尊“飞天”也同样手持泉州古老的南音乐器，如琵琶、二弦、三弦、洞箫、品箫、拍板、扁鼓、云锣、双铃等以及各种舞具。持品箫者双手正握箫向上高高举起；持琵琶者左右握琴颈，右手斜托琴腹；持二弦、椰弦者双臂前伸，双肘外展成圆；持洞箫者双手握箫，垂直于胸前。从这些“飞天”的动作姿态可以看出，她们呈现出的不仅是纯粹的舞蹈表演，而是边演奏边表演的乐舞形式。从场景来看，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和甘露戒坛的“飞天”不仅反映出北宋时代泉州大型佛教乐舞表演的盛况，反映出泉州佛教乐舞悠久的历史渊源，而且真实地反映了印度佛教乐舞与南音文化巧妙结合后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泉州佛教乐舞表演形态。

（二）佛教乐舞与传统民风

海丝文化遗迹中的佛教乐舞在泉州深受当地民风习俗的影响，呈现出强烈的地域特色。主要表现在：首先，对“飞天”色彩的影响。“曾有人评价泉州人在日常生活的生存空间中所接触的自然物的色彩都是偏于深色的：土壤是深红色的；山是深青色的；海是深蓝色的等等。这或许能说明泉州人对色彩的审美取向存在着遗传取向，受祖辈和环境的影响。”海上丝绸之路使大量来自印度半岛的人口在泉州定居，并与当地人通婚，使得部分泉州人成为中印混血，而泉州人由于常年生活海边，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泉州人人种的肤色较暗，偏于棕色。所以，不管是印度人本身偏黑的肤色，印度与泉州人通婚后的混血肤色，还是泉州人本身的棕色，都极大地影响泉州人在描绘人物时对于色彩的审美取向，即通常选用较为深色的皮肤颜色，这也许就是开元寺中的“飞天”都有着黝黑皮肤的原因，这个特点与中国其它地区白皙皮肤的“飞天”有着明显的不同。唐末五代，留从效任晋江王，拓建罗城并环城植桐，故泉州被称为“刺桐城”，红色的刺桐花，美化了泉州的环境，这一点从古代泉州人的诗作中可以看出泉州所呈现的色彩形象。南北朝诗人谢朓曾在咏泉州诗中写道：“南中荣桔柚子（红与淡黄色的），春草秋更绿。”宋代王十朋的《咏刺桐》诗中写道：“初见枝头万绿浓，忽惊火树欲烧空。”这些诗句描绘了泉州色彩绚丽、红绿相间的景象，大环境的色彩造就了泉州人的审美趣味。从地域来看，泉州地处中国东南部，按道教阴阳五行学说“赤为熊熊火燃之色，位居南，象征幸福”，即泉州属火，属红色，泉州土壤也是红色，泉州人也喜欢代表喜庆、

吉祥的红色，可见红色在泉州民俗文化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再来看开元寺的“飞天”，她们所呈现出的大面积绿色与大殿顶部以及柱子的大红色相搭配，突出的红绿色彩引人注目，由此可见，泉州人对于色彩选择的独特审美取向，也可窥见佛教乐舞“飞天”与泉州民风结合后的与众不同。其次，对“飞天”造型的影响。如前所述，据《鉴湖张氏宗谱》记载，开元寺“飞天”的雕刻者为泉州惠安的张氏逊，他是在宋代开元寺重建时，参与设计和雕刻了“飞天”，距今约 760 年。惠安是历史上有名的雕刻之乡，雕艺历史悠久，远溯晋朝，至今有 1600 多年的历史，而且，开元寺内的所有木作都是由惠安及德化的两支近百人的队伍共同施工完成的。“飞天”斗拱巧妙地运用了建筑力学的原理，将“飞天”身体贴合柱身，头顶的帽子顺势与梁结合，既融合了美学原理，又起到一种艺术装饰的作用，在全国的寺庙建筑中，只有泉州开元寺有此佳作。并且，开元寺“飞天”造型的另一个特点是，其造型并不完全，“飞天”腰部以下突出的斗拱部分的弧度，像是天女裙纱下弯曲的膝盖，即将蹬离柱面腾空而起。这一实用性与装饰性的完美结合，动静相宜，成为中国“飞天”形象中罕见的立体木雕，不仅造型精美，而且在整个建筑中起着支撑与承重的作用。正是在有着悠久雕刻历史的泉州，才出现了开元寺“飞天”如此精美且独特的造型，是智慧且技艺精湛的泉州人赋予了“飞天”形象新的生命，创造了全新的佛国之神。“飞天”是海丝文化与泉州传统木雕艺术相结合的典范。

（三）佛教乐舞与多元宗教文化

历史上的泉州兼容并包、开放热情，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在这里碰撞、交集、融会，多元背景之复杂难以想象。费尔南·布罗代尔说：“把各种宗教部分混合在一起，把某种思想从一种宗教移植到另外一种宗教里，甚至在必要时把一种宗教的某一教义或者仪式移植到另外一种宗教里，这是可能的。”泉州海丝文化遗迹中的佛教乐舞反映了多种不同的宗教文化来源，是佛教对其他宗教及文化元素移植或借用的结果。“一个社会成员向另一个社会所借用的东西是从多种可能性和来源当中进行挑选，其选择通常限于那些与他们目前的文化相互兼容的元素。”泉州海丝文化遗迹中的佛教乐舞正是从不同的宗教文化中选择了与佛教相契合的多种元素进行融合创新，从而产生了中国少有的带翅的“飞天”形象，这在当时的宗教艺术中是前所未有的。

如前所述，开元寺大雄宝殿中的“飞天”和南安桃源宫弥陀罗经幢的“飞天”造型是去掉了传统“飞天”的飘带，增添了双翼，而十字架和有翅膀的天使原本属于中世纪基督教不同教派的标志，但宋代的泉州，因多种宗教文化在这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融合，从未有过翅膀的“飞天”，也身附双翅，凌空翱翔，姿态轻盈。开元寺内甘露戒坛屋架上 24 尊形如敦煌壁画的中国“飞天”，衣结飘带，手执泉州古老的南音乐器，这些“飞天”是基督教的天使安琪儿形象与泉州传统工艺的完美结合。

“飞天”的故乡虽在印度，但泉州佛教乐舞中的“飞天”从艺术形象上来看，并不是一种宗教文化的再现，而是多种宗教文化的复合体。她是融印度佛教天人、中国道教羽人、西方基督教的天使、西域“飞

天”、中原“飞天”长期交流、融合为一体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飞天”；她是融西方文化、印度文化、泉州文化于一体的“飞天”；她是宗教、世俗、艺术与建筑的完美结合。泉州佛教乐舞遗迹中的“飞天”，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而且是中国佛教乐舞的典型和奇迹。

四、结语

海上丝绸之路是经典学理传播之路、是文化交流之路、更是艺术交融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根本意义和内涵，就是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泉州海丝文化佛教遗址给后代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海上丝绸之路”佛教乐舞文化遗存，为现存的或为一种消失的古代文明或乐舞文化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或者至少是特殊的历史见证，为后人认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佛教乐舞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泉州海丝文化遗迹中的佛教乐舞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世纪人类文明交流的历史轨迹，印证了多元乐舞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第四课闽南文化——泉州沿海古镇“海丝”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探索

泉州地处福建东南海滨，濒临台湾海峡，海岸线曲折漫长，避风港湾众多；有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三湾之中，又有若干支港，故有三湾十二港之称。泉州湾有洛阳港、后渚港、法石港、石湖港；深沪湾有祥芝港、永宁港、深沪港、福全港；围头湾有金井港、围头港、石井港、安海港。众多的港湾便于海上交通与作业，凭借得天独厚的港湾优势，泉州“民以海为耕，商凭海为市”，开展海外贸易。早在唐代泉州就与广州、交州、扬州同列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到了宋代，泉州港进一步繁荣，北宋元祐二年（1087）泉州市舶司的设置，使泉州的海外贸易如虎添翼，泉州港跃居四大贸易港口之首，“况今闽粤莫盛于泉州”。福建路·泉州府元代泉州对外贸易的范围遍及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和东非等地，与泉州有着海路交通贸易联系的国家、地区多达近百个，泉州一跃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相媲美的东方第一大港，成为“梯航万国”的国际贸易大港。泉州的三湾十二支港，均为宋元对外交通的港湾。明代，政府虽厉行海禁，但泉州仍有商人冲破禁令，驾舟出海，私人海上贸易兴盛不衰，安海、石井等支港成为海上私商“泛海通蕃”的港口；清代，蚶江、永宁等支港则是与台湾贸易往来频繁的港口，有的还以台湾为中转站开展海外贸易。

泉州人凭借着港湾众多的优势和敢闯敢拼的心态，在不同时期不断开拓、发展海上贸易，取得辉煌的成就。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的海上通道，也是沟通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通道。尽管昔日辉煌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已经载入史册，但悠久的海上贸易历史给泉州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与“海丝”相关的史迹、文物、习俗、故事、传说等；展示着那曾经的辉煌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也造就了泉州独具特色而丰富多采的“海丝”文化资源。

一、泉州沿海古镇“海丝”文化资源丰富多采

泉州是我国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核心区、“东亚文化之都”。长期以来，各级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存进行维修保护和环境整治，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保护了大批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遗存就像一颗颗璀璨的珍珠散落在泉州各地。泉州沿海的三湾十二港所在地，在历史发展变迁中有许多发展成为历史悠久的古镇。在这些古镇中至今仍拥有众多十分珍贵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物古迹。有耸立于海口或江口作为航标，曾为无数中外船舶引航指路的石塔，如蚶江镇石湖始建于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重建于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的六胜塔、永宁镇建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的万寿塔（又名关锁塔，俗称姑嫂塔），为“关锁水口镇塔也，登之可望商舶来往”。有吐纳百货的古码头、渡口遗址，如蚶江镇石湖的林銮古渡、东海镇法石的文兴码头、美山码头、金井镇的围头古渡等，它们曾为货物集散地，见证泉州曾经有过的中外经贸交流的繁荣历史。有为了便利于港口码头的商货运输和行旅往来而在近海靠海的古渡口建筑的桥梁，如洛阳镇建于北宋皇祐五年至嘉祐四年（1053-1059）的洛阳桥，是中国第一座跨海湾平梁式大石桥；安海镇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的安平桥，是我国现存最长的跨海石桥。有沿海民众为祈求神灵保佑航行平安，而建造的与航海及对外贸易有关的宗教建筑，如东海镇的真武庙、文兴宫、美山天妃宫、洛阳镇的昭惠庙、深沪镇的崇真殿、安海镇的昭惠庙等。这些庙宇不仅是当时商人、渔民、旅客祈求神灵保佑海上航行平安的精神寄托，而且有的还是郡守望祭海神之所。有清代经营海峡两岸贸易的商行、店铺以及商邦巨贾的故居，如永宁镇的“永进商行”、“荣兴商号”等，石井镇有郑运锦往台湾经商贸易致富后兴建的府第，后称“中宪第”；永宁镇有清代台湾鹿港最大郊商林元品的故居“大夫第”等。还有众多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相联的信仰、习俗、故事、传说、歌谣等非物质形态的“海丝”文化资源。古镇“海丝”文化资源呈现出种类齐全、内容丰富、时间跨度大等特征。

泉州沿海古镇至今所拥有的海丝文化资源不仅多姿多彩，而且各具特色。如东海镇主要拥有的是宋元时期遗留下的古码头渡口遗址以及真武庙、妈祖庙等宗教建筑，还有独具海洋特色的民居建筑蚵壳厝，以及东海浔埔女头饰、服饰及海洋习俗；洛阳镇、安海镇主要拥有的宋代修筑的桥梁以及与桥有关的祠、庙、庵、堂等建筑物；蚶江镇主要拥有唐宋时期的林銮古渡、蚶江古渡、石湖古渡、六胜塔等古码头渡口遗址及航标，而且蚶江因在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被指定为与台湾鹿港对渡贸易的口岸，因此拥有许多见证清代与台湾进行贸易往来的涉台文化资源。永宁、金井等古镇不仅拥有见证海洋贸易的“海丝”文化资源，而且还曾是政府派兵驻守，以御外敌的海防重地。明洪武二十年（1387）在今永宁镇修建永宁卫城，下辖有福全、崇武、中左（今厦门）、金门、高浦（今同安）五个千户所，并设有祥芝、深沪、围头三个巡检司。因此拥有不少海防设施的遗址及相关文物。如永宁古卫城遗址、城隍庙、金井的福全所城遗址等。不同时期各具特色的“海丝”文化遗存在泉州沿海各镇积淀并得以延续。这些绚丽多彩、独具特色的“海丝”文化资源见证了泉州沿海古镇海上贸易的繁荣历史，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丰富的“海丝”文化资源也

为泉州沿海古镇发展文化产业奠定了基础。

二、泉州沿海古镇“海丝”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重要意义

（一）“海丝”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可促进古镇经济的发展

文化产业是以文化资源为基础，文化创意为核心，文化科技为动力，充分发挥人的智慧，进而创造财富与就业的新兴产业。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和各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早在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就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党的十八大再次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可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在新时期发展经济的重要战略。泉州沿海古镇丰富的“海丝”文化资源是泉州人的骄傲，也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基础。将古镇的“海丝”文化资源通过开发，形成满足市场需要的文化旅游产品以及在出版发行、广播影视、表演艺术、网络文化、动漫游戏、休闲娱乐等方面的文化产品。让海丝文化资源走上市场，不仅显示其文化价值，而且凸显其经济效益，并通过与古镇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为古镇创造财富，为村民特别是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创业就业机会，从而进一步促进古镇经济的发展。

（二）“海丝”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是保护古镇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途径

泉州沿海“海丝”文化资源作为泉州辉煌历史的见证、文化的载体，记录着丰富的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信息，是泉州社会发展演变的印证，对其进行保护有助于我们延续历史、传承文明。传统的保护与传承方式是通过立法、立碑的手段进行强制性保护，但是保护的方式与途径应该是多样化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化开发也是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的一种重要途径，通过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使其焕发生命活力。历史文化资源的可持续保护不仅需要文物工作者和文物管理部门的努力，更有赖于地方公众的参与，但是古镇民众对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不是很强。经常出现当文物主管部门为某个“海丝”文化遗址获得相关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感到高兴、欣慰时，却也常出现一些村民对此有埋怨言语的现象。个别村民认为一些故居、商行遗址申报为某一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建筑物就不能改建，更不能拆除，只能居住使用，而历史建筑物的基础设施，又无法满足现代人多样化的生活需求。不少村民对“海丝”文化资源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许多涉及“海丝”的文物，随意堆放，暴露在外，导致损坏严重或遭贼盗窃，个别村民甚至在文物遗址旁随意地违章搭建、乱丢垃圾，影响历史文化遗存的整体环境。通过对古镇的“海丝”文化资源合理有效地进行产业化开发，实现产业价值，使村民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能调动村民对“海丝”文化资源保护的积极性，从而自觉地爱惜它，传承它，发展它。而且，对“海丝”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也能为“海丝”文化资源的保护提供一个更加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从而使古镇“海丝”文化资源得到更好的保护与传承。

（三）“海丝”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可提高古镇民众的文化素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泉州沿海古镇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民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增

长。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泉州沿海古镇的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产品及其文化服务有所改善，但古镇的文化建设在整体上滞后于经济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不少村民的娱乐生活仍然单调乏味，一些低俗的娱乐活动和劣质文化产品经常乘虚而入。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提高村民的精神文化素质，加强群众文化建设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和谐的基础。文化资源经过产业化开发所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是一种渗透着社会意识形态、道德素质和价值理念的特殊产品，它不仅具有一般商品所具有的使用价值，更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知识价值和审美价值。通过对泉州沿海古镇“海丝”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让多样化的文化产品，丰富古镇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深入挖掘“海丝”文化资源中符合时代要求的内涵，如不畏艰难、敢闯敢拼、团结协作、开放包容、回报社会等精神，使它们的价值以产业化的方式为社会公众所认识和了解，让民众在消费文化产品的同时，提高了自身的精神文化素质。

三、泉州“海丝”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途径探索

历史文化资源对于发展文化产业有很大的优势，但文化资源不是文化产品，更不是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实质是文化资源不断转化为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价值实现过程，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在保护泉州沿海古镇的“海丝”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探索如何合理、科学的开发利用，以实现文化资源的产业化价值，形成产业优势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近年来，泉州市有关部门在“海丝”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产业化开发领域做了许多工作，文化资源产业化得到一定重视和发展，并取得一些成绩。本文谨就推动沿海古镇“海丝”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途径进行探索。

（一）坚持科学规划，促进保护开发利用

泉州沿海古镇丰富的“海丝”文化资源是进行产业化开发的前提和条件，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依托，但并不是所有的“海丝”文化资源都有着产业化的价值或者都适合进行产业化开发。因此要对泉州沿海古镇“海丝”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根据海丝文化资源的现状，进行分类与筛选；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开发”的原则，整合、遴选出适宜于产业开发的文化资源，根据文化资源的特性进行文化创意，科学规划、探索不同的开发利用模式，确保“海丝”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对一些物质文化资源要以保护为主，在确保不损坏其历史本来面目前提下进行适度有限开发。如一些故居、商行、店铺可开发为博物馆、图书馆、民俗展示馆、地方文化中心或者茶馆、咖啡馆；要定期对建筑物进行修缮，让其建

筑精华延续下去。一些古码头渡口遗址，如东海镇的美山、文兴码头、蚶江镇的林銮古渡等现在作为码头的功能已经丧失了，我们可在不做硬件调整的前提下，将它开辟为遗址公园、滨海公园。这样既可以保护遗址，又可为当地民众提供一个休闲娱乐及展示地方民俗风情的活动场所。洛阳桥、安平桥等古桥梁不仅要保护好其历史本来面目，而且要对其周边的环境进行治理，在古桥的两端可开辟名桥公园，并利用周边已有的人文环境开辟旅游文化街。如洛阳桥可依托桥北的洛阳古街及昭惠庙、义波祠、古井禅寺，桥南的桥南古街及大王公庙、蔡襄祠等，开发为一个集旅游、休闲、文化、购物、娱乐、朝圣于一体的文化

旅游街。对一些跟“海丝”有关的历史人物、民间传说、民俗风情、传统工艺等非物质文化资源，要深入挖掘其深厚的内涵，将其拍摄制作成系列以“海丝”文化为背景的影视，或者制作成网络游戏、动画片等，开发以影视、动漫等内容为主的文化产业，以新的表现形式来重新诠释；或以海上丝绸之路为素材创作一批高规格、高水平、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这样，在全面调研泉州沿海古镇“海丝”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根据其现存状况，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地进行产业化开发。

（二）依托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文化遗产以其独有的魅力和所蕴涵的丰厚历史文化信息而颇受旅游者青睐，通过对文化遗产的参观欣赏、感受体验，旅游者能更直接地感受文化遗产的博大精深、珍贵奇稀。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是文化资源产业化的一个重要模式，泉州沿海古镇不仅拥有丰富多样、各具特色的“海丝”文化资源，而且古镇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地方特产、风味小吃也独具特色。如东海镇以海蛎、洛阳镇以大蚝、鲫鱼、祥芝镇以紫菜、蚶江镇以红膏蟹为地方特产。这些为旅游产业开发提供了很好的载体。针对泉州沿海古镇“海丝”文化资源小聚集，大分散的情况，沿海古镇可联合起来，共同打造“畅游古港”海丝专线旅游，将沿海各镇不同的“海丝”文化资源、自然风光、民俗民风、民居建筑、风味小吃、地方特产、特色工艺等结合起来开发特色旅游项目，并且将其与历史文化名镇（村）、美丽乡村旅游、滨海旅游相结合。将古镇民俗风情与现代休闲旅游结合，满足都市人的休闲需求。同时积极开发各种旅游文化产品的配套功能，突出文化特色，把商业与文化结合起来。让游客在观光游览、休闲度假获得精神食粮的同时，也能让其品尝、购买到各镇的土特产和工艺品。推进“海丝”文化资源向文化旅游产业转化，做到“以文化兴旅游、以旅游兴古镇”。

（三）整合社会资源，打造多元文化产品

文化产业所进行的是文化经济一体化的生产经营活动，它的中心任务是将有限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有用的文化产品，包括文化实物产品、文化服务产品及其衍生形态。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仅是“海丝”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一种模式，古镇“海丝”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还需要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下，鼓励、引导社会多方力量参与文化产业，整合开发泉州沿海古镇的社会资源，实现不同资源的共享互补，把原本分散的、不成系统的社会资源依据市场需要有效地加以集中、提炼和优化，使之形成具有市场价值的文化产品。在演艺娱乐业、动漫游戏业、网络文化业、文化旅游业、文化会展业、创意设计业和广告服务业等方面打造多元文化产品。如以“海丝”传奇故事、传奇人物为题材，以高水平的创意加以故事化、情节化拍摄一批表现泉州海上贸易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发展影视业。而且泉州沿海古镇拥有不同时期特色的民居建筑，如金井镇的塘东、永宁镇的旧街有大片明清时期的闽南“皇宫起”古大厝、洛阳镇的洛阳街有民国初年建造的洋楼、东海镇有以海蛎壳为建筑材料的蚶壳厝，等等，这些古建筑可以成为电影、电视的拍摄场地，从而扩大泉州沿海古镇“海丝”文化的知名度。海上贸易的艰辛奋斗史以及古桥、古塔建筑的民间

传说丰富多彩，可以编撰演绎成各种故事，通过创意开发为通关电子游戏或者动漫作品。文化+演出是最近广为采用的一种表演艺术产业。泉州古镇“海丝”文化题材的丰富性也可以在多种表演形式中找到自己长足发展的空间。大型歌舞《云南印象》的成功运作模式，也可作为泉州古镇“海丝”文化题材在演艺业的“他山之石”，结合泉州古镇景点，编制《印象泉州》、《海之古镇》、《丝路古港》等实景演出；在演艺业还可将传统文化资源嫁接到现代科技之上，通过超大3D投影将虚拟背景与真实表演巧妙地融为一体，营造出沉浸式全景震撼效果，打造自然、艺术、人文及科技相融的视觉盛宴。在出版发行方面可将泉州三湾十二港的历史记载、“海丝”文化资源以及“海丝”文化研究成果进行整理汇编、出版发行，把古镇一个个不同时期的文化资源变成一条线、一个面，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的、有深度内涵的文化精品，等等。这样，将“海丝”文化资源以创意特征的形式产品化，不断满足文化消费市场的多层次、多样化的需要，使其成为具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特殊商品。

（四）利用多种渠道，宣传促销文化产品

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为文化产业提供资源供给和资源保障，但再丰富的文化资源并不天然就是文化产品和产业成果，它必须经过产业化开发和市场化运作才能转化为文化资本和文化产品。发展文化产业，除了以丰富的文化资源为依托，重视其文化产品的开发外，还要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运用市场运作方法，将“海丝”文化产业推上市场，为社会所认同、所接受。要实施多元的营销战略，加大宣传促销的力度，为“海丝”文化产品提供多元化的销售渠道。如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大众媒体平台，宣传和促销“海丝”文化产品，各镇可建立“海丝”文化产业的电子商务网站，或者借助泉州市已经建立的“海丝泉州旅游资源交易平台”等平台，进行网络宣传和促销，以提高文化产品信息受关注及被接受的程度。建立组合、联合营销策略，利用古镇已有的知名企业、特色产业、特色小吃，在产品包装、工业设计、文化创意等融入“海丝”元素，使“海丝”文化产业与古镇原有的生产企业相互促进、相应生辉。节庆是最能够体现一个地区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独特性的载体，利用目前泉州市特别是沿海古镇影响较大的知名文化节庆，实施节庆营销策略。如通过蚶江镇的“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永宁镇的“永宁古卫城暨城隍文化节”、祥芝镇的“渔民文化节”等知名文化节庆开展多样活动，将“海丝”文化产业融入其中，从而展示、宣传、推广古镇“海丝”文化产品。还可通过会展的形式把古镇文化产品推广到社会，如举办“海丝”文化产品推介会、博览会、“海丝”文化艺术会展、古镇“海丝”文物精品联展、古港古镇“海丝”文化遗产美术作品邀请展、摄影作品精品展等，向国内外集中展示古镇极具特色的“海丝”文化资源和文化产品，为文化产品进入市场搭建展示舞台。也可通过参与其他地区相关的会展，在交流、体验中传播、推广古镇“海丝”文化产品。利用泉州沿海古镇是著名的侨乡及港澳台同胞的祖籍地，将“根亲”文化与“海丝”文化结合起来，宣传、推广古镇的文化产品。这样，通过多渠道、多样式的促销方式，提高沿海古镇文化产业的知名度，让文化产品为社会所接受。

总之，散布在泉州沿海古镇的“海丝”文化资源绚丽多彩，就像一颗颗璀璨的珍珠散落在古镇的各个角落，闪烁着光芒的历史，蕴含着深厚的内涵。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护“海丝”历史文化遗存，在保护的基础上要将这些珍珠串连起来，合理地进行产业化开发，使之在开发中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从而推动古镇经济文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让“海丝”文化资源在推动泉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建设，打造新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经贸文化交流往来，在“一带一路”发展大局中发挥新的功能与作用。

第五课 泉州海丝文化时代意义

——立足“一带一路”战略 增强文化自信

一、文化自信的提出

2016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且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文化，作为一种基因、血脉和传统，是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和自觉践行，是基于心理优越性和行为坚定性的文化表现。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渗透在文化主体活动的方方面面。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文化形态，是一个底蕴深厚、内容丰富、结构合理、精神开放的文化体系，是当代中国可以并且能够实现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需要全体中国人学习传承，并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滋养，获得生机无限的灵感，去实现古老中国复兴的民族梦想。

二、泉州“海丝”文化的时代意义

泉州，是一座有着两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丝”）的起点，历史辉煌，底蕴深厚。在今天“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中被赋予“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的

城市定位。对此，已经获评“东亚文化之都”的泉州踌躇满志、积极融入，欲将历史优势、文化优势等转化为新的发展机遇，担负起建设“海丝”先行区的历史使命。

作为“海丝”起点、闽南文化核心保护区、东亚文化之都，泉州文化多元包容、内蕴丰富。细数泉州文化，其中尤以“海丝”文化最值得夸耀。纵观整部中国文明史，农耕文明几乎成为中华文化的标签。殊不知，在公元 15 世纪以前，中国已是当今学术界公认的海洋之王。中国海洋文明的高峰——宋元时期，古刺桐（泉州）港从造船技术、航海技术、航海线路、丰沛物产到海神信仰之先进与文明，无不印证了“东方第一大港”泉州，乃是世界海洋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放眼当今天下，世界大航海时代造就的日不落大英帝国、世界霸主美利坚合众国皆是世界性的海上强国。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利益的抗衡，俨然就是两种文明的对决——海洋文明国家与大陆文明国家的对抗。因此，中国要真正崛起，就必须走向海洋，而其中的路径之一，乃是挖掘自身丰厚的海洋文化资源，从中获得实现民族自信的力量源泉。在此语境之下，泉州这一千年古港，无疑成了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宝贵的文化资源。

三、对泉州“海丝”文化的多维审视

（一）从当下出发：认识“海丝”文化，为海洋文明时代树立民族自信

说起泉州，很多国人并不熟知；至于“海丝”文化，更是知者寥寥。因此，普及“海丝”文化，应是当务之急。所谓“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文物局专家姜波如是解释：“是指古人借助季风与洋流等自然条件，利用传统航海技术开展东西方交流的海上通道，也是东西方不同文明板块之间经济、文化、科技、宗教和思想相互传输的纽带。”

作为古代“海丝”的起点，泉州自唐至宋元明清蜚声海内外。马可·波罗曾盛赞过这里是世界上最繁荣的都市。至今，泉州“海丝”文化在器物、精神、制度等各个层面仍留有丰富的历史遗存。物质文化遗产，如：真武庙、文兴宫、古码头、古沉船、海印寺、伊斯兰教徒

墓碑遗址、古“海丝”遗址、市舶司、航标六胜塔和姑嫂塔等；精神文化遗产，如：水密隔舱造船技术、永春制香技术、九日山摩崖石刻与祈风仪典、多元宗教并存、爱拼敢赢的海洋性格、融合着外来语的闽南话等。这些因“海丝”起点而形成的海洋文化、海洋精神，乃至海洋文明，在素以农业文明著称的中华文明史上显得弥足珍贵，并不断引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注。

2014 年，泉州以其灿烂的海洋文化历史和优秀的传承，应邀参加联合国组织的《国际海洋年·中国一日》主题活动，在世界海洋文明的舞台上发出了中国的声音。因此，我们应大力推广泉州“海丝”文化，让世人更多地了解中国历史上的海洋文化，增强中华民族文明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二）贯通古今：千年传承，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提供历史文化支撑

“一带一路”是习总书记 2013 年提出的战略构想，旨在借用古代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符

号，主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为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战略，泉州市政府制定了“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行动方案，并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建设“海丝”泉州的构想，力图在推动“海丝”文化国际交流合作和中华海洋文明传承创新上先行先试。

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泉州“海丝”文化千年传承不断，至今遗留的诸多与海洋商贸、海洋文化相关的史迹与遗址，不仅体现古泉州作为宋元时期东方重要港口城市的历史地位、航海和贸易传统以及国际间文化交流的特征；而且完整而突出地呈现了长期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古代中华帝国在其海洋文明发展高峰期的盛况。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致函，2018 年泉州将牵头联合九城“海丝”申遗点，以“古泉州（刺桐）史迹”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提出申报，并有望成

为我国第 53 项世界文化遗产。

在文明的时间维度上，对话历史，让传统文化走向现代。泉州“海丝”文化千年传承不断的这一不可多得的资源，将为 21 世纪“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提供源源不断的历史文化支撑和生命力滋养。

（三）融汇中西：多元开放，为构建和谐、开放、包容的新型大国点亮灵魂

在泉州“海丝”文化中，最为人瞩目的当属多元并存的宗教文化。彼时的泉州，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波斯、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等诸种文化交融汇合，留下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景教（古天主教的一个支派）、天主教、印度教（婆罗门教）、基督教、摩尼教（明教）、日本教和拜物教、犹太教等多达几十种的宗教，且不同宗教间一直保持相互影响、和平共处的关系，深刻地影响着泉州社会的发展。泉州因此获得“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美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将全球第一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定址在泉州。

反观世界宗教发展史，不同的宗教之间往往相互排斥、相互抵制，甚至引发战争冲突。而在泉州，千百年来几十种宗教竟能在同一街区、同一庙宇中彼此包容、和平共处、充分交流、自由发展。究其原因，乃在于泉州宽广的胸怀、包容的态度和兼收并蓄的精神。正是这一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胸怀气度，吸引了来自全球几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使者、旅行家、传教士前来经商、传教，造就了“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东方第一大港”的繁盛气象。

泉州“海丝”文化中这一博大包容、开放自信的文化力量无疑为我们构建和谐、开放、包容的新型大国点亮了精神灵魂。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受到了来自海洋文明的西方体系的强烈挤压。今天，在文明的空间维度上，中国的崛起需要融汇东西半球的不同文明，以自信、开放、包容的姿态面对世界，去实现与西方的和解，为中国的崛起赢得和平之路。

（四）走向未来：超越时空，为中国开创人类文明的新起点助推一把力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写道：“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熔于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今天的中国，要成为世界领导型的国家，就必须如汤因比所言，在文明的自身维度上演绎一个全新的身份，不仅在于传承传统文化，也不仅在于实现中西方文明的融合，而是在贯通古今、融汇中西之上，开创一种全新的中国的新型文明范式。

也许，泉州“海丝”文化，这一堪称是千百年前的“全球化”，这一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一个不同文化之间和平对话、沟通交流的经典范例，可以为中国的未来激发文化自信的灵感，期待祖国的未来更加美好。

第六课 泉州 21 世纪新“海丝”文化意象营造研究

2016 年初，位于“一带一路”核心区的泉州市政府公布了《泉州市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行动方案》，提出泉州“海丝”先行区建设要以文化为引领，在推动“海丝”文化国际交流合作和中华海洋文明传承创新上先行先试。作为政府发展战略，新“海丝”文化是一种政府指导下的城市文化新范式，它不等同于闽南地区文化，两者的感官意象也有区别——新“海丝”文化代表了新形势下政府指导的地方发展模式的先试先行，而闽南文化则代表了传统的地方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本文通过梳理泉州市历史文化脉络，理清闽南文化意象与泉州城市文化意象之间的关系，利用交通可达性评价方法考察城市文化景观的接触性对新“海丝”文化意象营造的影响，并对构建新“海丝”文化营造积极的文化意象，发挥其文化引领作用提出一些看法。

一、泉州的历史文化意象

城市文化意象是指城市历史文化景观为代表的城市文化外在物质元素给现代人们所带来的感官感受，它是人们了解城市的第一判断依据，城市文化的文化引领作用由此而来。不同时代的文化意象，不仅反映当时的社会状态与风气，也同时在引领时代的发展潮流。以泉州为例，目前世人对泉州有若干个清晰可读的意象，大致有宋代的“海滨邹鲁”，元代的“多元融合”，明、清、民国的“逞忿械斗”和当代的“敢拼会赢”、品牌之都、东南亚文化之都等。人们经常可以在各种场合看到这类意象的物质具现化，如市中心的开元寺、清净寺，郊区的九日山祈风石刻和瓷窑遗址等等。

泉州最早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是以“海滨邹鲁”的地区意象逐渐进入到人们视野之中。靖康之变后，南宋偏安一隅，但随着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福建地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经过相应的资源积累，到了南宋大儒朱熹过化漳泉之后，泉州城市文化兴旺发达起来，如开元寺朱熹的对联所称的“此地古称佛国，满街皆是圣人”。儒家文化意象的形成与出现也影响了此后城市文化的走向与脉络，至今泉州的不少城市景观仍反映了这一意象，如东街重建状元牌坊上的坊联“八闽形胜无双地，四海人文第一邦”，再如中山路府文庙建筑群等等。

元代由于异族统治的特殊政治环境，世人对泉州的意象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称之为“多元融合”。北宋哲宗元二年（公元 1087 年）北宋政府就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当时做为海外贸易的中转站。到了元代，泉州海外商业贸易兴盛，城内蕃汉并存，本土的儒家、道教、佛教文化与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天主教、摩尼教等域外宗教文化并立。以伊斯兰文化为例，泉州的伊斯兰文化在元代达到相当的规模，到元代伊斯兰清真寺已建立了多座，其代表是建造时间最晚不晚于南宋绍兴元年（公元 1131

年) 位于涂门街的清净寺, 此外还有始建年代仍存争议的灵山圣墓等伊斯兰文化景观。

自明代开始, 随着明清两代禁海与开海政策反复, 泉州地区竞争力下降, 商贸经济发展逐渐衰落, 其城市地位从“七闽之都会”变成了“东南一隅”。明嘉靖皇帝“圣谕”即称:“漳泉等府豪民通番入海, 因而劫掠沿海军民, 肆行残害, 甚则潜从外夷, 敢行作叛”。清乾隆皇帝也曾说:“漳、泉等府民人, 凡遇争夺田土、集场及口争等事, 辄率多人, 执持器械, 以决胜负。大姓欺凌小姓, 小姓不甘, 又复纠集多人, 复仇报怨。”这种泉州地方重利轻义、忿忿械斗的意象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甚至可以说, 民国时期

福建民间地方势力, 特别是漳厦泉三地, 民间械斗的陋习就是这一意象的具体延续。到了当代改革开放之后, 泉州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海洋文化的熏陶, 城市发展反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城市形象也焕然一新。2011年新福建精神的提出——“爱国爱乡、海纳百川、乐善好施、敢拼会赢”十六个字, 特别是“敢拼会赢”的表述将闽南地区核心城市泉州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塑造了泉州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新城市形象。此外, 刺桐之城、海丝起点、品牌之都、东南亚文化之都等与地方特色相联系的城市特质意象也纷纷进入到人们的感知领域。

通过对泉州历史城市文化意象发展脉络的梳理, 可以看到泉州的城市文化意象有两个特征:

一是泉州的城市文化意象流变说明了外来因素的刺激是其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动因, 如中原文化、异域文化、倭寇等。这些外来因素既有政府政策引导的, 也有经济规律起作用的, 还可能是民间非主流的, 没有外来的刺激与接触——教育、贸易甚至战争, 就没有意象的转变。这些意象综合起来就形成了泉州独特的历史文化气质。

二是直到改革开放之后, 泉州的城市形象才逐渐脱离闽南区域形象而独立, 但目前人们对两者意象的区分度并不显著, 两者形象总是混为一团。在《行动方案》中还有“注重发挥已申遗成功的南音、木偶戏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力, 为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作贡献”的表述。而对于闽南文化, 福建省2014年已专门制定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 并由厦门市、漳州市、泉州市三市共同组织实施。

作为人类文明的中心, 城市文化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在我国现代制度型城市化过程中, “文化引领”就是以城市为出发点, 以政府意志为指导的城市物质景观建设所引起的文化重构。重构后的新“海丝”文化须在继承泉州市现有历史文化资源的前提下, 塑造出符合国家战略定位的新城市文化。

二、城市中的文化景观与意象营造

对城市本身来讲, 社会文化区位理论认为城市空间格局的形成并不完全依靠经济规律, 思想感情和象征体系往往也能左右城市的结构和发展。美国学者Walter Firey于20世纪40年代对波士顿土地使用情况的研究表明, 通过经济竞争手段并不能解释波士顿城市空间的格局形成过程和特点, 因此只有将

文化和价值观念置于区位理论中，才能解释城市的结构和发展。根据这一理论，可以通过观察城市的结构和发展，利用交通可达性分析方法来获得对城市文化景观空间位置可接触性的客观认识，从而解构出城市文化特征，以便有目的有方向的进行新城市文化的营造。

泉州市政府要构建的新“海丝”文化建设不等同于闽南文化建设，它的着眼点必须首先集中在泉州城市本身上。通过对城市中文化景观城市空间分布规律的研究，以文化景观的交通可达性作为评价指标，反映出其在城市区位中的可接触程度。文化景观的可接触程度越高，它对文化景观这一“文本”的读者的影响程度就越深，产生的文化意象就越强烈。因此，文化景观的可接触性是营造新“海丝”文化的重要考核点之一。泉州市内散布着各种域外宗教历史建筑（遗迹），以及传统的本土历史文化遗迹，这些景观代表了泉州城市文化的形象。引入交通可达性评价方法，利用最直观的距离法，选取泉州市区两大交通枢纽（动车站、客运中心站）、市区商业中心（中山路）、市区三大五星级酒店（泉州酒店、悦华酒店、迎宾馆）作为地标，测量地标到 18 处景观（泉州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考察点：万寿塔、六胜塔、石湖码头、江口码头、九日山祈风石刻、真武庙、天后宫、金交椅山窑址、宋代海关市舶司遗址、开元寺、伊斯兰教圣墓、清净寺、草庵摩尼光佛造像、府文庙、德济门遗址、洛阳桥、来远驿遗址、清白源井）的交通距离，取其平均距离进行比较（见表 1）。

表 1 泉州十六处城市景观可达性统计表 (单位: km)

考察点	动车站	客运中心站	中山路步行街	悦华酒店	迎宾馆	泉州酒店	平均距离
1 万寿塔	38.3	27.7	33.3	26.9	26.6	32.9	30.95
2 六胜塔	38	26.5	30.3	26.2	24.1	29.9	29.17
3 石湖码头	37.6	26.1	29.9	25.8	23.7	29.6	28.78
4 江口码头	16.3	3	8	3.9	4.3	7.6	7.18
5 九日山祈风石刻	7	13	9.1	13.5	17.9	9.4	11.65
6 真武庙	14.1	1.5	5.7	2.7	4.7	5.3	5.67
7 天后宫	10.5	2.9	2.1	3.4	8.2	1.7	4.8
8 金交椅山窑址	23.6	17.9	17.8	17.5	24.1	17.4	19.72
9 宋代海关市舶司遗址	9.4	4.2	0.94	4.6	9	0.52	4.78
10 开元寺	9.6	5.6	0.9	6.2	10.3	2.2	5.8
11 伊斯兰教圣墓	12	3.9	4	4.5	8.2	3.9	6.08
12 清净寺	10.4	3.3	1.6	3.9	8.1	1.5	4.8
13 草庵摩尼光佛造像	28.5	17.7	23	16.9	20.6	22.7	21.57
14 府文庙	10	3.7	0.91	4.3	8.6	0.83	4.72
15 德济门遗址	10.5	2.9	2.1	3.4	8.2	1.7	4.8
16 洛阳桥	16	11.5	11.6	12.6	10.6	12.1	12.4
17 来远驿遗址	10.9	3.5	2.5	3.1	8.9	2.1	5.17
18 清白源井	9.5	4.5	0.75	5.1	9.3	1.2	5.06

注: 以上数据来自百度地图。

通过以平均交通距离为衡量标准的交通可达性的比较, 可以看到泉州的城市文化景观接触性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文化景观形成较和睦融合的城 市景观群。 到各城市标志点平均交通距离 $\leq 10\text{km}$ 的 11 处城市文化景观包括了儒家、 佛教、 妈祖、 伊斯兰教、 道教等主要文化宗教传承, 涉及黄土文明和海洋文明, 跨度从唐代至今各个历史时期, 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景观群。

二是城市文化景观个体分布不均。 到各城市标志点平均交通距离 $\leq 10\text{km}$ 共 有 11 处城市景观——府文庙、 天后宫、 清净寺、 德济门遗址、 真武庙、 开元寺、 伊斯兰教圣墓、 江口码头、 宋代市舶司遗址、 来远驿遗址、 清白源井, 占总文化 遗产 考察点的 61.11%; $10 \sim 20\text{km}$ 的 有 3 处——九日山祈风石刻、 洛 阳桥、 金交椅 山窑址, 占总文化遗产考察点的 16.67%; $\geq 20\text{km}$ 的 有 4 处——草庵摩尼光佛造像、 石湖码头、 六胜塔、 万 寿塔, 占总文 化遗产考 察点的 22.22%。最近 3 处考察点平均距离与最远 3 处考察点平均距离之比为 1: 6.22, 相差悬殊。

三是城市文化景观分布与泉州人口密度不重合。 泉州市鲤城、 丰泽二区共有 11 处到各城市标志点

平均交通距离 $\leq 10\text{km}$ 的城市文化景观，占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考察点总数的61.11%。而据泉州市2015年统计年鉴数据，鲤城、丰泽二区常住人口只占全市常住人口的11.65%。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泉州城市文化景观区位中心优势明显，对城市文化意象的塑造性较强，但分布不均、与人口密度不重合，可接触性较低。相较整个空间规模与结构来讲，城市文化景观影响较小，引领作用不明显。此外，泉州的城市意象受到区域意象，特别是农村地区（据泉州市2015年统计年鉴数据，泉州市户籍人口中，非农业人口只占全市总户籍人口数的28.3%）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大，以农村所代表的传统闽南文化意象超越了泉州城市本身的城市意象，并取而代之。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泉州城市文化特质鲜明，多元文化融合影响深远，但在闽南文化强势盛行之下，其自身城市形象却单一、不彰显的原因。与之对比的是同处闽南文化圈的厦门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厦门市户籍人口中城镇人口超过了总户籍人口数的80%，加之交通条件的改善，城市宣传力度的加大，其城市形象已经逐渐摆脱地域限制，国际大都市的意象提升了城市的品质和地位。所以，要想使新“海丝”文化在泉州市的发展中起到文化引领作用，就要充分利用其区位中心优势，扩大其可接触性，增强其影响力。

三、新“海丝”文化意象营造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泉州的历史文化传承脉络清晰，资源丰富，并能形成相应的城市文化景观群，对于泉州整体城市意象的构成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在现代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在城市本体与农村地区分离的趋势下，泉州城乡之间的社会堕距与文化堕距日益显化，城市意象与区域意象逐渐分离，甚至产生矛盾；另一方面区域次级中心区过多，极大分散了泉州城市景观的接触性指标泉州各个次级文化如安溪茶文化、德化陶瓷文化、惠安女文化、晋江石狮精神、南安华侨文化等对城市的向心力偏弱，分散了中心城区城市景观群的作用。因此，泉州城市作为一个主体，其文化意象强度不足，影响范围偏小，其形象始终委身于闽南文化这一区域整体意象的羽翼之下，城市个性不明显。

在政府政策指导下，起文化引领作用的泉州市新“海丝”文化意象营造中必须注意以下两点要求：

一是注意地区传统文化与新城市文化的差异，塑造开放、创新的新城市形象。泉州新“海丝”文化的提出是服务于国家政策和地方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切合“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型窗口、平台的整体要求。新城市文化的建设必定要与闽南文化有所区别，有所侧重。以文化受众为例，据泉州市2015年统计年鉴数据，近10年来泉州市外来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比率基本稳定在15%左右。但随着新形势下经济的发展和需要，可以预测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对外交流重要的节点，泉州市也必将会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据2015年厦门市统计年鉴数据，2014年厦门全市经济总量较2005年增加了3倍多，常住人口则较2005年增加了108万人）。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城市的重新定位，必然引起相应的城市文化结构上的变化。新城市文化的建设必须在利用和改造地区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提升自身的兼容与多元性，消

除地方文化的负面影响。

二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城市文化景观的交通可达性指标显示，泉州城市内部各县区之间的文化景观的接触性差异较大，这对营造泉州市整体新“海丝”文化意象较为不利。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例如城市 VR 技术，在网络及媒体上塑造城市形象，缩短城乡差距，提高景观的接触性指标；一方面可以利用泉州多元文化的历史背景，以城市文化景观群为起点重新规划泉州多元文化景观带，打破现有的城市建筑单一风格，避免城市同质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结语

泉州 21 世纪新“海丝”文化意象，既不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现，也不是复述传统闽南文化，而是要在城市文化的重构当中给文化受众营造一种指向泉州城市的“开放、融合”的印象，文化受众可以很清晰的辨别这是泉州而不是厦门或其他城市。通过提升泉州城市文化景观的可接触性的程度，这种意象营造出的泉州城市文化与其它海上丝节点城市相比，城市特质更鲜明，更具影响力，也更符合国家对“一带一路”节点城市能力的要求。同时，以自身的城市特色历史文化为基础，提高城市文化景观的可接触性程度，将泉州与“开放、融合”的城市文化意象紧密联系起来模式，可为整个海上丝节点城市的城市文化建设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